

痛史明鉴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

华 原

北京出版社



痛 史 明 鉴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

华 原

北 京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痛 史 明 鉴

Tongshi mingjian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

华 原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北京朝阳区广益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110 000 字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27 011—48 010

ISBN 7-200-01203-3/D·84

定价: 2.10 元

序

栗 栗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已经彻底平息了，全党全民都在进行深刻的反思。东欧政局的剧烈动荡，又进一步促使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和世界的全局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现实生活一再告诫我们，尽管现在世界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尽管我们国内建设已经转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但是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的阶级斗争都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的这场平暴斗争就是一个明证。从国内范围来讲，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从国际范围来看，就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一场殊死较量。平暴斗争的胜利，保卫了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生存和解放进行斗争的成果，保卫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多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果，保卫了一个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人民共和国。这场斗争的胜利，对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惊心动魄的56天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一以贯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我们国家引上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早在拨乱反正之初，就有人开始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观点。他们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泽东光辉的一生；从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走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

从这时起，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连绵起伏，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涉及政治、思想、理论、文化等各个领域。十年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次大的较量——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四次大泛滥。十年的斗争历史充分说明，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不仅是理论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权问题。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不可调和的，切不可掉以轻心。认真回顾和记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历史教训，以此为鉴，教育自己、警戒后人，提高全党全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正是编著本书的基本目的。

本书的作者长期工作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线。这些年来，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和高度的警觉，密切注视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由来和发展，在同这些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掌握并积累了大量资料。平暴后不久，1989年7月，在北京市全市宣传部长会议上，作者曾作了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四次大泛滥及其严重的历史教训》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注意。本书即在此基础上用了半年左右的业余时间写成的，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

治、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各方面的表现综合在一起，便于读者综合分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和影响。尽量做到大事不漏，力保资料的完整性。全书对每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除提供必要背景材料外，还做了简要的分析，故它与一般资料不同，既有检索价值，又从各方面给人以启示。

作者比较注意不同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同表现，着重写了十年的历史过程，便于读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反思。

当然，由于时间有限以及作者工作领域的局限性，这本书还不可能对各个领域的资料收集得那么完整全面，但这仍然是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一本比较完整的综合性资料，是当前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干部的理论学习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如果能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配合使用，效果可能会更好。

1990. 4.

前 言

解放以来，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两次波及全国的政治大动乱。第一次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这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虽然持续时间只有70天，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损失，创深痛巨，害莫大焉。痛定思痛，为害最大的社会动乱往往会引出最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对酿成这场内乱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有了深刻的体会；经历了最近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人们又对另一种错误倾向的严重危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导致这场触目惊心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滋长、蔓延和泛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根本违背人民利益的社会思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

1979年至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9.6%，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1.8%，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5%，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自身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家赋予了盎然的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其中攻势比较猛烈、斗争比较尖锐的，有四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泛滥，四个坚持与这种政治上反动、理论上荒谬、逻辑上紊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四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大泛滥，就其危害而言，应该说是思想政治领域中一段千万不可忘记的痛史。痛史明鉴，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目 录

前 言	(1)
一、第一次泛滥——从“北京之春”泛起的	
寒流	(1)
播乱西单墙，泛起自由化	(2)
“理论风云”——思想混乱初起	(5)
白桦和他的《苦恋》	(10)
人生价值观的第一次大讨论	(14)
二、第二次泛滥——精神污染	(17)
论坛“怪影”——人道主义、异化热	(17)
“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王若水	(29)
文艺创作中的错误倾向	(33)
人生价值观的第二次大讨论	(36)
三、第三次泛滥——从理论攻势到政治攻势	(39)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升级	(40)
从“补课论”到“为资本主义平反”	
——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种种	(48)
从“过时论”到“超越论”——在坚持、	
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产生的理论倾斜	(52)
从“为自由正名”到“为资产阶级自由	
化正名”——在民主、自由、人权等	
问题上所造成的思想混乱	(62)
从地下的咒骂到公开的攻击——丑化、	

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辑录·····	(72)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方	
励之、王若望、刘宾雁·····	(74)
“文化热”中的思想混乱和政治攻势·····	(87)
人生价值观的第三次大讨论·····	(93)
四、第四次泛滥——从煽动学潮到策动	
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	(103)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总纲领·····	(104)
私有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	
纲领·····	(108)
实行多党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	
治纲领·····	(116)
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	
论基础·····	(118)
“新启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化	
战略·····	(123)
通向动乱之路·····	(128)
五、痛史明鉴——经验和教训 ·····	(136)

一、第一次泛滥—— 从“北京之春”泛起的寒流

第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1979年前后），发生在我们党着手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1979年前后，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在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理论战线上，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祖国的四化大业在拨正船头之后，正面临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局面。可是，就在我们着手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起却对全国人民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提出了挑战。他们把我们党大力倡导的解放思想的正确口号加以歪曲，打着反对“两个凡是”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在我们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制造新的思想混乱。1979年春天，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本来是一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会议，可是有的人却把拨乱反正的正确命题加以歪曲，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的方向；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王若水等人在会上相继发难，制造混乱。与此同时，务虚会外也出现

了一定的混乱，有的人继续使用在十年动乱期间使全国人民深受其害的“四大”作为武器，掀起了一场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风波。

播乱西单墙 泛起自由化

1978年10月下旬，在北京西单墙、王府井大街、天安门广场陆续出现了一些有严重错误倾向的大小字报、诗歌、漫画，使得初步形成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又重新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利用我们党和国家在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创伤，利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时期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向党和人民发难，在呼吁“民主”、“自由”、“人权”的喧嚣声中，有的人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开展辩论，进行蛊惑宣传，煽动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相继出现，并向全国一些地方蔓延。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非法组织的头头频频活动于地上、地下，搅起了一场一定范围的风波。从西单墙上发出的与四化大业格格不入的不谐和音与非法组织的组成、宗旨、活动情况来看，这明明是一股与我们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背道而驰的逆流，但却受到了国内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及国际反动势力的青睐，把它称之为“‘北京之春’民主运动”。

从所谓的“北京之春”吹来的并不是春风，而是倒春寒的寒流。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80多个，其中有些是由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如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贵州的“解冻”等。这些由少数坏人控制与把持的组织，从它们的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违犯国家宪法和法

律的。

它们打着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招牌，提出自己的宣言、纲领，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例如：

“解冻”在其《宣言》中声称要“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建立起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公然叫嚣，“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威信”，“打倒共产党就是人心所向”，“要改变制度”，“用资本主义管理国家”。还声称“要利用目前社会矛盾，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彻底摧毁社会制度”。^①

“上海民主讨论会”有的成员发表演说诽谤社会主义是“瘪三主义”，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调换人员”。他还说：“当局有十只指头，我们放出十一只跳蚤，让他们应付不了，一只也捉不住，越乱越好。”

“探索”散发号外指名攻击邓小平同志是“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其成员魏京生张贴小字报诬蔑“党中央是另一个政治骗子集团”，社会主义是“封建君主制”，叫嚷“要把现阶级赶下台”。^②

与此同时，他们到处串联，制造事端，煽动闹事。北京的傅月华同“中国人权同盟”勾结在一起，煽动和串连上访人员，打着“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横幅，游行示威，到新华门前请愿，围观群众达几千人，阻塞交通一小时，二千多辆机动车被迫改道绕行。“中国人权同盟”的一些人，曾于1979年2月中旬策划在西单“民主墙”召开万人控诉大会，到南海请愿。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人企图借助国外势力达到他们的目的。有人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写信，乞求支持

^① 原文如此，“社会制度”指社会主义制度。

^② 原文如此，“现阶级”指领导阶级。

人权运动，公然要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探索”等组织30多人与外国人有联系，每当他们贴出大字报即给外国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探索”成员魏京生把我军毙伤越军一万多人的战报以及自编的我军指挥员、战略意图等材料，出卖给外国人。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都发现，这些组织做好了准备，要在1979年“四五”煽动闹事。

从“北京之春”泛起的风波，虽然在当时的波及面并不大，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不容低估，对四化建设的破坏作用也十分严重。饱受十年动乱之苦的全国人民当然不能允许刚刚形成的大好局面被破坏。党和国家代表人民的意愿坚决取缔西单墙，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继续蔓延和泛滥起到了一定的遏制的作用。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对那些参与“北京之春”的绝大多数人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教育，投入到四化建设中来。但也有极少数人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一有机会便冒出来闹事。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转移到国外。1982年在美国创办的“中国之春”，就与1979年“北京之春”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中国之春”的许多成员来自“北京之春”的活跃分子。1979年“北京之春”闹事期间，有一个地下艺术和政治团体。后来它的许多成员移居海外，十年后又卷土重来。1989年1月12日它的部分成员在香港举办“星星画会十周年画展”，2月3日又在北京公寓举行义卖活动，为资助魏京生等罪犯家属筹集资金。这个组织的头头还宣称他已写了《重审魏京生》的剧本，准备在法国公演。1989年2月4日，方励之、陈军（原上海非法组织“民主之声”骨干分子，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所谓“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就是一次为“北京之春”追魂、妄图制造新动乱的会议。至此，1979年“北京之春”的所谓“民运人士”与1989年的动乱精英会师了。当年在“北京之

春”期间的活跃分子，如陈军、北岛（诗人，曾在1979年发起自发刊物《今天》，任主编）、任晓町等，都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场动乱和暴乱的鼓动者。

“理论风云”——思想混乱初起

在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理论战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左”的错误，对于推倒“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主流之中有逆流。理论界的少数人背离了理论工作的正确方向，与“北京之春”的鼓噪相互配合，在报刊上制造思想混乱。对他们来讲，批判林彪、“四人帮”也好，反对“两个凡是”也好，都只不过是“借力打力”，借着我们纠正自身的错误的时机反对我们要坚持的正确方向。我们分析和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他们攻击和反对的却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本身。在报刊上，在一些理论工作的会议上，他们以各种名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坏。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可是，正像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其鲜明的立场激怒了所有的资产阶级一样，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也以其鲜明的立场激怒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鼓动者，把他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的人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之为“四根棍子”，有的人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1979年三月份称之为“三月黑风”，就在“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不久，王若水在1979年8月14日到上海华东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师大作报告说：

我不太同意说四项坚持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先验的东西，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了。都有个认识过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承认到承认，从不理解到理解，让人去探索，允许人去讨论，甚至也允许人去怀疑。有人主张，在两个“凡是”的条件下，进行思想解放，那样，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条件就多了，哪个前提条件正确呢？还得考查一番。要坚持四项原则，还得让人家提问题，讨论问题。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允许人家提问题。你说，四项原则是正确的，总要讲出个道道来，要坚持四项原则，就要让人首先解放思想。没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解放思想的关系，是否可以划个框框，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下，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才能解放思想？我说恰恰相反，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这次报告中，他还说：

把四项原则作为前提条件，就会妨碍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理论版（即第五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与四项基本原则唱对台戏的文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洪林的系列文章：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1979年6月22日）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人民日报》，1979年10月5日）

这几篇文章，并没有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作出任何科学的解释，而是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其实质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他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标榜过社会主义，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表示疑问；因为“四人帮”提出过“全面专政”，就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专政”；因为林彪、“四人帮”曾经盗用过党的领导的名义，“有人对党的领导有怀疑”就“很自然”。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李洪林公然为怀疑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辩护，他说：“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是‘怀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照这种逻辑，四项坚持岂不就变成了“四项怀疑”？逐项地去怀疑，还有什么坚持可言？像这样一些肆意制造思想混乱的文章，理应受到批评和抵制。对这些批评意见，李洪林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便要出来较量一番。1983年，我们党反对精神污染受挫，李洪林出版了《理论风云》一书。在这本书中，李洪林重新发表了他这三篇引起严重思想混乱的文章，并且对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横加指责，说这些批评是“从背后搞突然袭击”，是“扣帽子”、“打棍子”，是“理论风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重新制造思想混乱。1989年，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度严重泛滥之时，李洪林感到时机已到，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上发表了这组系列文章的第四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前言中说：

——1979年，我写过三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